

风雨阳光

邓宗岳文选

卷一



贵州民族出版社

中国经济写作研究会贵州组编

風雨陽光集

鄧宗嶽文選

文心探頤

報林顯英

藝苑拾萃

東行記勝

史海鉤沉

貴州民族出版社

扉页题字：何龙昌
责任编辑：薛丽斌
装帧设计：邓庆康
 邓军康
校 订：杨继昆

风雨阳光集

邓宗岳文选

中国经济写作研究会贵州组编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289号）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技校校办厂排印

850×1168 32开本 23印张 600千字

印数 1—2000册

1996年8月第一版 1996年8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12—0680—6/I·214 定价：19.80元



上：参加 1990 年中国经济写作研究会武汉年会。

下：与贵州省写作学会第二届常务理事们。



上：《企业春秋》编委会部分编委与
龚贤永副省长(前排左三)。

右：主持 1988 年中国经济写作研究会
贵州年会开幕式。



右：一九九四年获全国美好家庭奖，全家喜笑颜开。



左上：能获得 1985 年贵州财经学院运动会竞走第二名，关键是自己和自己竞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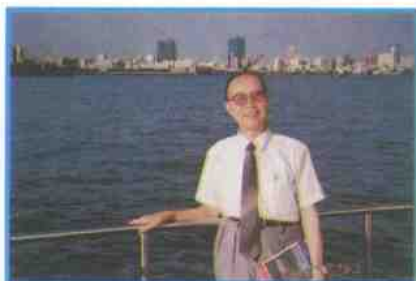
上：读书即是休息，休息即是读书。

左：与老同志上台高歌一曲，再展正茂风华。



左：一九九三年海峽兩岸旅行學術研討會在台北召开。

下：高雄港和大陆不应该隔离着海峡。



下：在花莲，戴上东道主热情的花环。



右：在台北与表兄余钟骥一家共享天伦之乐。





上：与陈静芳在日本
东金市横芝町政府。



上、左：东金市日中友协欢迎会略为
严肃，岩濑家族欢迎会却轻松愉快。



右：在片山辉夫家接受东京
NHK 电视台采访后留影。



师长、同行和朋友（代序）

袁 昌 文

《风雨阳光集》的作者贵州大夏学院副院长邓宗岳教授，是我的师长、同行和朋友。

我一直把宗岳先生当成我尊敬的师长，他虽然没有直接上过我的课，但无论是在学识上，还是人品上，他都堪称我的老师。

他是资深新闻专家、写作理论家。我还是小学生的时候，他已经当上了报纸的编辑和记者。他一生与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从事写作整整半个世纪，撰写出版了数十本书，发表了数以千计的文章，写作成果达500多万字。这本《风雨阳光集》，仅仅是他的写作成果的一部分。他的作品和论文，20多次在省内外获奖，他的名字上过多种名人词典和名录。

也许是长期担任编辑的原因，宗岳先生的文字功夫相当好。他的文章，用词准确，语言简洁，结构严谨，书写规范，有一种使人信服的逻辑力量。1985年，我写了一本《微型小说写作技巧》，请教于他，他在看清样时，找出了许多疏漏；1995年，我主编的《基础写作教程》，请他作顾问，他又从清样中找出了不少问题。他的文字基本功实在令人佩服，从他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严谨的写作态度和文风。

他博学多才，涉猎面很广。《风雨阳光集》就是证明。这本书包括了许多种文体，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既有学术论文，又有新闻作品，还有散文、报告文学、旅游文学、诗词、对联等。仅以新闻作品而言，他写过多种消息、通讯、评论。仅以评论而言，

本书就收录了他的新闻评论、时事评论、经济评论、思想评论多篇。他的博学多才，由此可见一斑。

宗岳先生一生坎坷。他坐过牢，当过右派；被“劳动教养”，被“遣送下乡”；挨过斗，受过打。他一生中最美好的20年是在“风雨”中度过的。但是，在逆境中他不悲观丧气，始终不忘写作，不忘进取。他的20多万字的《农业社怎样发展畜牧业》，是戴着右派帽子与人合作写出的；他的一个剧本是在劳教农场写的；修马路的空闲他写了《筑路工人之歌》；在缝纫机上写了不少诗词。这种毅力，这种进取精神，可敬可佩。1978年，他的问题彻底平反，重见天日。但他却宽容大度，既没有发不完的牢骚，也没有冲天的怨气。他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冰消寒意尽，万象竞更新。廿载辛酸泪，八方化雨情。枯枝发嫩芽，老马识归程。愿趁夕阳好，轻装赴远征。”（《戊午秋“右派”问题改正有感》）他要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向写作的更高境界“远征”。他不分白天黑夜，节日假日，不倦地工作，除了本职和兼职工作外，每年总有数十篇文章见报，总有一二十万字的写作成果产生。《风雨阳光集》，既是这些写作成果的精选，也是宗岳先生学识与人品的结晶，它勾画了作者人生旅途的足迹，表现了他“笔耕伏案不觉苦，露沾育才岂畏难”的精神，我们从中既可学到如何作文，还可以学到怎样做人。

宗岳先生既是我的师长，又是我的同行和朋友。我们都在高校上写作课，他在财院上经济写作，我先在师大，后在教院上写作，有机会听到他在写作理论与写作教学上的真知灼见；我们又都是贵州省写作学会成员，有机会见到他为学会办实事的朴实作风；我们还合编过多种教材、专著，有机会领略他的认真、谦逊精神。在我们的合作中，有时他任主编，有时我任主编，他总是谦让。他是《企业春秋》丛书的主编，我是他的助手。通常是我先统稿，他再定稿。他定稿时，每个数字必对原稿，每段引文必

对原著，就连一个标点也不放过。依靠他把关，十二本《企业春秋》，300万字，没有出过大的差错，受到企业界和读者的好评。在我们合著的书中，有一本140万字的《千种文体写作》、一本90万字的《写作技法大观》，他推我为主编，他作副主编，照样一丝不苟地撰稿、编稿，从不在主编、副主编的名份上计较。这种不为名利的谦让精神，使我们每一个与他合作过的同行都深深感动。

宗岳先生“华发今已尽飞霜”，依然“花甲年逾犹奋笔”，愿先生古稀松柏枝常翠，秋蚕吐丝织新篇。

(1996年3月6日)

袁昌文先生系著名写作理论家、贵州教育学院教授。现任中国文章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写作学会理事、贵州省写作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有12部专著和大量作品问世。

风雨阳光路 笔耕五十年（自序）

7年前，正值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我曾写了一篇题为《风雨阳光情更浓》的文章在报上发表。如今，朋友们鼓励我将多年来的笔耕成果加以选择结集出版。我想，自己50年间走过的道路上，有风雨，也有阳光，以《风雨阳光集》作为书名倒是贴切的。

我出身在一个老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清末秀才，后因停开科举，成了贵州第一批留日学生。他学过法政，学过医，古文根底不错，对作文尤情有独钟。我和姐妹们小时，父亲就为我们找了家庭教师，除补习学校功课外，还指定我们读《幼学琼林》、《古文评注全集》，并出题让我们作文，有时还亲自批改。他经常说，好文章多用骈俪句子，读起来才上口。在他的督促下，我逐渐养成了作文习惯。1936年我进小学四年级时，参加全国小学生作文比赛。我写的一篇题为《当前形势下中国的小学生应该怎么办》的征文，就得了第二十三名。当值两块大洋的儿童书局的奖品书券换成崭新的《格林童话》和《伊索寓言》拿回家时，我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从此也更鼓足了作文的劲头。从小学到中学，我的作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也一直是级刊、校刊的主编。我写过散文、论文，写过诗歌，也学写过旧诗词，有的还在《贵州晨报》（或是《革命日报》已记不清了）的副刊《小小的拳头》上发表。这些十分稚嫩的东西，我非常珍惜，一直保管到解放后，自然“文革”后就不复存在了。

1944年下半年我进了贵州大学，有人劝我学中文，但那时正是抗日烽火遍地燃烧之际，青年人忧国忧民之心让我选择了政治

经济学专业。而我并没有停止过写东西。1945年，我同几位朋友办了一个刊物《学生生活》，在上面发表过一些有关校园生活的短文。这时，我认识了贵阳《力报》社长李思齐，有时我也去报社同他谈时事，谈办报。在他的影响下，我对新闻工作产生了兴趣。1946年，我的一位表兄冉隆勳也到《力报》担任总编辑，他劝我去《力报》学学编报。于是，我成了《力报》一名不在册的编辑。这一年，国民党政府搞“复员”，大学的暑假特别长，我的时间就相当充裕。白天，我同报社的朋友们一道跑消息，写稿件；晚上，就顶着星斗到报社上夜班。有时，我还替《西南风》（一位由《力报》人员创办的四开报）写点民俗风情的稿件。这可以算是我从事写作的开始吧，从此，整整半个世纪，我同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0月，学校开学了，我回花溪上课，仍担任《力报》驻花溪特派记者。以后，《力报》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了，我还为《新世界》、《人报》等报刊写稿。《人报》专门开辟了“黔中夜话”专栏，由我负责撰写有关贵州掌故的文章。另外同几位朋友办了一份刊物《笔圃》，由于物价高涨，只出了三期便办不下去了。1948年我在贵大毕业后，受聘在旧《贵州日报》任编辑主任。这时我一心想继续深造，报社夜间上班，白天事不多，我就把毕业时的论文改写成一篇四万多字的《论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去报考研究生。但南京国民党政府正忙于疏散，我的论文和申请书也不知所终。

1949年8月我满怀激情投入了新中国的新闻工作。我参加了刚创刊的《新黔日报》（现《贵州日报》前身），在地方版既当编辑又当记者。1950年报社调整机构，我调到城市组当副组长，分管财经工矿的编采工作。我一面从事新闻实践，一面探索新闻理论，还在新闻写作中不断练笔。我学会了从大量来稿中提炼出有新闻价值的素材撰写综合报道，也学习在采访中培养新闻敏感写出有份量的新闻稿件，并且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记得我采写的

关于贵阳市市场调查的通讯《从虚假购买力的消失到真实购买的成长》和有关贵州省私营运输业改造的文章《从蜕变到新生》，得到《人民日报》转载。1953年我由盘县参加土改回到报社后，调到总编室任秘书组副组长。我除了协助总编辑发稿和看清样外，还负责编辑部的一些行政工作；主持了纪念十月革命35周年的“中苏友好月报道组”的活动；有一段时期还兼管工矿组的工作。同时，总编室办起了《编辑业务》刊物，我负责编辑，写了许多报评稿件。我涉猎了几乎是有关新闻业务的各个方面。往往深夜看完清样回家，第二天清晨又到报社上班，不知疲倦地工作。我十分感谢报社的王立山、张向阳、李冀峰等领导对我的精心指教和严格要求，使我不论是新闻业务还是写作水平都得到很快提高。

正当我专心致志地扑在工作上，夜以继日地写稿、编稿、评稿和写作的时候，作为大规模的肃反运动的前奏，我们报社一些社会历史“复杂”的“旧人员”，突然于1954年4月被调去省行政干校脱产学习。我长期搞业务，希望有机会在政治上得到提高，自然十分高兴。可是在学习结束的“忠诚老实运动”中，竟没有人能过关。全班108个学员在9月底全部进了省公安厅看守所。经过一年零八个月，我的历史终于查实清楚。我被安排到贵州人民出版社担任科技编辑。我十分满意这个能够安静地边学习边写作的岗位。一年当中，我编了十多部书，其中有些是学术著作。我特别喜欢科普文学。我读了苏联作家伊林写的许多书，自己也渴望将来成为科普作家。可惜不久我的梦又破灭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卷进“五七风暴”的。在“整风”中我没有写过大字报，只是到出版社工作后曾向报社领导写过申诉报告，这被说是“攻击肃反”；还牵涉到对打算办同仁刊物《文学青年》表示赞成。我终于被定为右派集团成员在1957年被送到中八农场劳动教养。有意思的是，我在运动中还同科技组组长解德明同志合写了一部20多万字的著作《农业社怎样发展畜牧业》

(上下册)在我劳教中还得了出版。得到的二百多元稿费对于我当时处于困境中的家庭毕竟是一种安慰。

在“中八”一呆便是四年。起初我不敢再写东西了。不久农场出版了《中八通讯》，我和一些从新闻出版系统来的“右派”被指定担任通讯员，有时在场部开通讯员会大家还经常见面。为了“争取”，我在这一方土地上还得提起笔来，报道本大队的好人好事。1962年春节时我还同一位姓程的“同学”合写了一出反映农场生活的短剧，自己也参加演出。

1961年10月1日我得到“解教”，1962年5月回到出版社。但出版社迟迟没能安排我的工作，自己也觉得在原单位难免自惭形秽。这时贵阳正在办民办中学。我向贵阳市教育局写了封自荐信，很快就被安排到和平中学教书，出版社也办了调动手续。我上的是语文课，命中注定还是离不开写作。我还担任校长周杏村先生的“秘书”和从事教务工作，在周先生指点下写各种来往公文和总结报告。在这三年中，我认真钻研了高初中语文教材中的名篇，系统学习了语法和写作的理论。学校中的不少学生原来学习不错，都因为成份不好被剥夺了读公办学校的权利。他们到和平中学后刻苦学习，自觉性很强。学生会自己办起了校刊，自己组织各种集体活动，我担任他们的指导，经常同他们在一起共同写作。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了经理、厂长、部门负责人，这是十分令人欣慰的。

谁也没有料到民办学校竟成了“复辟”的“罪证”。“四清”中学校撤销了，我不得不参加办事处组织的民工队去修盐沙备战公路。我在劳动中体验了生活，写了《筑路工人之歌》和一些反映工区职工情况的报道。接着，“文革”开始了，我们家遭了浩劫。家被抄了，我和爱人受到毒打。家中历代积存的书籍字画荡然无存，我所珍惜的写作成果一扫而光，较好的家具也被运走了，至今没有清回。1971年9月，我被单身下放农村。当时，孩子们有

的上山下乡去当知青，有的参加学生兵团去修铁路，爱人有幸一人在老家独守空屋。当扎着大红花的车队载着我们这些下放居民离开贵阳时，我真说不清胸中的滋味。下放后的第一个除夕夜间我冒着刺骨的寒风沿着漆黑的公路跋涉几十公里回到贵阳这个熟悉的故土时，看到喷水池大放光明的节日彩灯，不禁悲从中来，难道我就被这块孕育我的土地抛弃了吗？我多么想把自己凄凉的感情倾泻在笔端。可我更急切地渴望了解妻子孤寂的心情和孩子们在乡间的困境，何况当时一个“摘帽右派”是没有写作资格的啊。在乡间，我学会了以缝纫为生，笨拙的手艺居然受到群众的欢迎，苦恼的却是精神上的荒漠。当然，我还能读《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诗词》；后来，又觅到了一部劫后余存的《红楼梦》和一本《杜诗散译》，它们一直陪伴我在下放中吸取精神营养。

林彪的“九一三”事件给下放人员回城带来了希望。1974年初，花溪区彭官小学聘我去帮他们筹建初中班，我除了上课外，还帮学生组建红卫兵队，编排了各种活动节目，并担任了彭官大队党支部不挂职的“秘书”，撰写总结和各种来往文书。半年后，我转到贵阳钢厂子弟中学代课。我担任一个“乱班”的班主任，还是上语文课，我又重操旧业了。两年多的时间，我为班上写了许多演出的诗歌。其中长篇朗诵诗《教育革命花满园》反映了我这个班的可喜变化。这些作品中不少是文革语言，但毕竟为我提供了大量练笔的机会。1976年10月我落实政策后正式安排到省政协机关工作。我在从事大量行政事务工作的同时，还同秘书处的周国鼐同志一道负责编辑机关墙报。当时省政协是省统战系统的联合组织，许多有学识的老先生写稿十分认真。国鼐是旧社会贵州省长周西成的公子，旧学很好，我从他学到了旧诗词的写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的“右派”问题得到了彻底改正。1979年3月我调到贵州财经学院，担任汉语和写作的教学，又同青年们朝夕相处了。我既能够探讨学术，又可以放手写作。过

去的22年耽误了黄金年华，如今又有了另一个黄金岁月。我同书房中挂的“夕阳无限好 人间重晚晴”的横幅朝夕相伴。我要争分抢秒，充分利用这个阳光灿烂的时期。我在教学中，曾废寝忘食，阅读了大量的古籍和文学作品；同时探讨一个个理论问题和学术问题，写下一得之见。我参加了沉寂多年的学会活动，并同一些同行和朋友筹建了一些学术团体。我把学会活动当作写作的契机。我在80年代前期写的一些学术论文今天看来有的还有一些学术价值。十年前写的一组关于“词组法”的文章，尽管尚不成熟，我想今后还将会显示出它的意义。在贵州省写作学会，朋友们编著了一本本学术著作，其中也渗透有我的心血。我还在朋友们的协作下，主编了一套12册《企业春秋》，介绍了一千余家企业在改革开放道路上前进的步伐，既为社会服务，也为学会创收。我忘不了我们教研室的颜冬申老师，有我相似的遭遇，同样的奋发拼搏。我们一起创建了贵州省经济写作学会、贵州省大学语文教学研究会等组织，出版了一些教材和论文集。而他鞠躬尽瘁，终于与世长辞了。朋友和家人都劝我以身体为重，我想，健康诚宝贵，事业价更高，我不能离开写作啊！

1985年我又参加筹办了《经济日报·贵州版》，后改名为《贵州经济报》。我长期分管编辑部工作和言论工作，自己也采访写稿，被评聘为主任编辑。1994年才改任顾问。8年多时间，我写了200余篇消息、通讯、写实报告和各種评论，还探讨了新闻学中的一些理论问题。这些文章不少是反映一时一地的信息，具有一定局限性，但也是我写作领域的一片广阔天地，我得益是不小的。

此外，我还参加《贵州财经学院学报》的筹办和担任过编委，并担任过贵州省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领导小组成员和《贵州财经学院院史》编写组的主编。这些工作都将我的生命同写作紧紧联系在一起。1992年、1993年，我有幸到日本访问和到台湾参加学术会。归来后发表了长篇系列报道，为我的写作开辟了新的领域。

如今，我已经在贵州财经学院退休。我认为，退休不过一个人生活的不同阶段的标志，原来的青春阶段结束，另一个黄金岁月又已开始。我们祖国已开始了新的黄金年华，祖国的儿女难道不是已感觉到“报国之心不已，报国之日正长”吗？现在，我又受聘为贵州省文史研究馆馆员，还参加了贵州大夏学院的工作。“大夏”是新生的婴儿，正在成长时期，自己难道不是同样在茁壮成长吗！

岁月荏苒，半个世纪过去了。回顾自己笔耕的50年，风风雨雨孕育出的感情是说不尽的，而金色阳光照耀下的道路今后会更长。我是一个普通党员，一个人民教师，一个人民记者，也是一个普通的写作理论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这些都是光荣的。我应该拿出更多的成绩才无愧于这些光荣的称号。

这本书虽名为《风雨阳光集》，但风雨时期的作品都已在坎坷途中散失了。这里只是阳光时期中的一部分。不少作品自己并不满意，不过由于在某些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也就选入了。我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将过去较有意义的断简残篇补上。1989年我退休时写过一篇感怀诗，中有两句：“甘为春蚕结玉茧，愿作蜡烛亮尘寰”。这本书中所选的东西，断丝也好，烛泪也好，总是自己人生旅途的一点足迹，如对社会能有所用，也就不负此生了。

1996年元旦